

何,与后代的“𣎵”与“𣎵”有何联系,也未作任何解释。“𣎵”与“𣎵”、“𣎵”无法从字形上有直接的联系,字义更不能将两者等同,“郭店简”与“上博简”研究者均将其存疑,等待再作深入研究。再如《关雎》中的“君子好仇”,《毛诗》为“逖”,其它三家《诗》与《礼记·字义》为“仇”,两者为假借字,为“配偶”意,“郭店简”中为“𣎵”,研究者认为是“仇”的假借字,但“上博简”中则为“𣎵”,在字形上与“仇”、“逖”无法找出渊源,因此“上博简”的研究者注云:“字不识,郭店简作‘𣎵’,释‘逖’,今本作‘仇’”^[1]。我们看到,“郭店简”与“上博简”中所出现的这些异文,无论是字形字义相同还是字形字义皆不同,到了《礼记·缙衣》与四家《诗》版本中,则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统一,其差异远远少于竹简本之间的差异。显然为汉代人在汉初时期曾对战国《诗》本做过系统的整理与统一,否则这种差异的消失是不可能的。

当然,我们今天所见的《礼记·缙衣》篇、《毛诗》及于后代文献中辑佚的三家《诗》未必为汉初时期的形式,似乎不能说明《礼记·缙衣》与四家《诗》的文字相近是汉初时期进行整理与统一的。但是通过对“郭店简”、“上博简”《缙衣》与今本《缙衣》、四家《诗》相对照,其中在两个竹简本中都出现了一首逸诗,“郭店简”为“𣎵大夫共𣎵𣎵,𣎵人𣎵”,“上博简”为“𣎵夫二𣎵𣎵𣎵,𣎵人𣎵”,而此逸诗在今本《礼记·缙衣》篇、四家《诗》以及汉代任一诸子文献的引《诗》中再无出现,可见,在汉初时期在对《诗经》版本的整理与统一过程中,不知何种复杂的原因,将此《诗》从《诗经》的版本里删除了。汉初时期对《诗经》的整理,除却有文字的统一、篇名的统一、卷次的编序、篇次的编序等诸多方面的整理外,还有对某些具体篇目的删除,对《诗经》进行过版本的整理,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国时期的《诗经》文本混乱的局面,使之逐渐统一为“四家《诗》”,这应当是在汉初时期一个相当重大的文化举措。

二、篇目的变化

战国与汉代《诗经》文本篇目的差异主要体现于战国文献与汉代《诗经》文本比较所出现的逸诗现象。《诗经》文本的大部分篇目发展至春秋末年已经基本定型,但是战国时期淆乱纷繁的各版本,仍存在少量篇目上各有出入的现象。这些少量不同的诗篇,是经过汉代学者的整理与统一,最终确定为今本的305篇的,这其中某些诗篇因为种种原因而被删减,从而变为逸诗。据统计,战国时期所著作的各类文献引《诗》均有不同程度的逸诗现象,虽然这些文献也经过了汉代人的整理与重新编纂,但是在引《诗》上则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战国文献的面貌,保留了逸诗现象。而汉代所创作的各类文献的引《诗》所出现的逸诗现象则非常少见,这显然是由于《诗经》文本经过整理与统一后形成的结果。

经过我们统计,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的文献,如《论语》引逸诗2条,《墨子》引逸诗3条,《荀子》引逸诗7条,《吕氏春秋》引逸诗5条,《战国策》引逸诗4条,《庄子》一书总共引诗1条,便为逸诗。除了传世文献以外,出土文献中的逸诗也层出不穷,除了前面我们所举“郭店”与“上博”简《缙衣》篇中的“𣎵大夫共𣎵𣎵,𣎵人𣎵”为其中一首外,《上博简·孔子诗论》中所提及的《诗经》文本,其中提及诗58首,其中有逸诗8首,所占比例为13.7%。这些逸诗,相互之间不同,可印证战国时期的《诗经》尽管出现了与今本相似的比较稳定的文本,但在诗的篇目上还存在着某些篇目的不同。而逸诗的现象到汉代文献中却较少出现了。如四家《诗》尽管存在诸多方面的差异,但在诗的篇目上,《毛诗》比齐、鲁、韩三诗多出六篇“笙诗”,共有311篇,“笙诗”仅为“有其篇目而亡其辞”,实际四家诗的篇目是相同的,已不存在逸诗的问题。而考察汉代文献引《诗》,除陆贾《新语》有逸诗1则,《汉书》中汉武

帝诏书中有逸诗4则外,汉武帝之后的诸子文献引《诗》已经基本没有逸诗现象了。陆贾《新语》与汉武帝诏书皆处于汉代较早时代尚未对《诗经》版本进行系统整理修改时期,而汉代对《诗经》文本进行系统的重新整理与编纂后,逸诗再无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频繁,便成为必然。

三、篇名的差异与类序的变化

战国时期的《诗经》版本不仅在文字使用、篇目上与汉代文本有差异,在篇名的使用上也有一定的差异。《孔子诗论》为战国时期系统论述《诗经》的一部学术论著,其中所提及的58篇诗篇,有53篇明确提及篇名,而在这53篇中,其中有8篇篇名与汉代《毛诗》不同,如《毛诗》本《杕杜》、《荡》、《兔爰》、《甫田》、《褰裳》等,《诗论》本分别为《折杜》、《腸腸》、《又兔》、《大田》、《毛诗》、《涉秦》等,可见至汉代初年,对《诗经》的篇名也有一定程度的整理与重新命名。

上博简《孔子诗论》问世后,《孔子诗论》中所论及的《诗经》类序则成为学者争论的焦点。《孔子诗论》中一改以往风、小雅、大雅、颂的诗卷顺序,而是先颂、后大雅、小雅,然后为风。关于这点与今本的不同,学者间产生了极大的争议。有人认为这说明战国时期诗卷的顺序应当为颂、大雅、小雅、风,如马承源先生便明确提出“竹书是以《颂》、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、《邦风》为序的”,并从《诗》的内容性质、《诗》的产生时间、乐调和举行的场合等多方面给予充分的论证,马承源先生明确提出“秦始皇焚书坑儒后,今本所传承的类序并非是孔子所正的《诗》的类序”^[2]。而有的学者则认为《孔子诗论》仅仅为论诗顺序,不足以说明战国时期《诗经》文本的类序。

我们认为,战国时期已经有了较完整的《诗经》文本,《颂》、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、《风》四类皆已经编撰成集,但此四类有可能为单类相传,亦有可能结集而传,战国时期,《诗经》文本传承比较混乱,此四类在结集过程中,有《颂》、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、《风》的排序情况,亦有可能有《风》、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、《颂》的类序,亦有单类传承的情况,而此种纷繁复杂的《诗》本传承,至汉代初期经过系统的整理与编纂而定为今本《诗》序的情状,而因何种原因最终定为此种类序,值得我们作深入研究。

除以上几个方面外,通过对《孔子诗论》的考察,我们还能确切知道战国《诗经》文本与今本不同的地方还有以下其它方面,如《邦风》变成了《国风》,研究者称“邦”改为“国”为避刘邦讳而改,但《礼记·曲礼》中明确称“《诗》、《书》不讳,临文不讳,庙中不讳”^[3],为何由“邦”而“国”,此种变化是否与当时大的政治制度的变化有紧密的关系?值得我们深入考证,再如《孔子诗论》分《颂》、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、《邦风》四类,除发现了“邶”以外,无其它更细的分类,没有发现如“周南”、“召南”、“周颂”、“鲁颂”、“商颂”等今本典籍所记载的进一步分类,也找不到这种分类的迹象。这同样值得我们深入考证与探讨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李零.郭店楚简校读记[M].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7:87.
- [2]郭店楚墓竹简[M].文物出版社,1998:133.
- [3]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一)[M].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:198.
- [4]高亨.池曦朝.试探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《老子》、《马王堆汉墓帛书·老子》[M].文物出版社,1979:111.
- [5]马承源.《孔子诗论》简序解析[M].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研究.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2:25-27.
- [6]礼记·曲礼上.十三经注疏标点本[M].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:86.